

黎鸣文存 · 第一卷

LMINGWENCUNDIYIJUAN
湖北人民出版社

人生的求索



十九世纪——神学死了
二十世纪——哲学死了

二十一世纪——人类吁求人生的诞生

人——只在拥有原恶（任性、懒惰和嫉妒）
义上，是真正平等的，无论伟大或庸人，均
不能幸免，除非死亡。重要的是，在生活中
须不断追求能够克服原恶的人性原精神：信
求知和仁爱。

人生的求索

黎鸣文存·第一卷



鄂新登字 01 号

人生的求索

黎鸣文存·第一卷

黎 鸣

出版：湖北人民出版社
发行：

地址：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印刷：武汉市新华印刷厂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17.125

字数：426 千字

插页：5

版次：2000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 120

定价：25.70 元

书号：ISBN 7-216-02787-6/I·261

序 言

往前推 20 年，我的志向是科学技术专家，从不曾想象自己会成为一个靠写文章来表达什么思想的人。然而，似有鬼使神差，或许还真就是命运，我今天竟成了一个不能不去表达一种什么思想的人。

命运究竟是什么呢？客观的时势，客体的压力、挑战，主体的遭遇，主观的感受和应战，所有这一切的综合，大概就是命运。通常人们都认为，命运是不依任何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但仔细想想，命运的促成，大概与人们自己还应是密切相关的。一个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和能动精神的人，有时确实有可能为自己的命运作出某种有意义的导向，或者用另一种话来说，即与命运抗争，力图改变命运。我不敢说我就是这种人，但我愿意说，我非常希望成为这种人。

如此说来，我之成为一个思想者，虽然在过去不曾设想过，但客观时势和环境客体不断向我挑战，我也确实可以说是在非常不得已的情况下，不能不尽力作出应战，一为生存，二为温饱，三为发展，说得更冠冕堂皇一些，还可以说是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思来想去，首先是对抗自己的命运，冀图改变自己的命运，但后来也越来越发现，个人的命运，其实与社会的命运、民族的命运，乃至全体人类的命运，都是密不可分的。就像大河里的一滴水，什么时候你被阳光的热力拉出了水面，成了水汽，蒸腾为云；或者什么时候你因寒冷被滞留在某地，结成了冰，但毕竟你更多的时候和

更大的可能还是大河里的一滴水，河的命运紧紧关系着你的命运。

正是因此，人们的思想不应该也不可能只关心一己之私，而必须放眼周围，注意群体，这样才引出诸如道德、良知、良心、公正、正义、法律、民主、自由等等人类共同的人性的话题。

这里献给读者的三卷《文存》，即是笔者二十多年来的一次较完整的关于上述种种话题的总汇。

第一卷《人生的求索》，是笔者的一部形式上较杂的文集，其中有小说、诗歌、随笔、短论、书评、演说辞，以及关于一些著作、译作的序言。文集中的小说，在我，也是希望通过文学的形式表达一种批判的思想的较早的尝试，这种尝试的受挫阻止了我朝成为一位作家的努力，而最后走向了理论性的思维。

第二卷《人类的新生》，是笔者的一些理论文章的汇集，从文章前后出现的时序中不难发现，笔者最初曾是一个自觉的科学主义者，即一个自觉的社会信息论者，后来转向了信息哲学，再后来更成了一个哲学的批判者，甚至公然认为，西方哲学已经死了，不再可能真正关切人类的命运了，人类的新生时代将吁求“人学”的诞生，走向“人学”才是人类的新生。

第三卷《人性的外衣》，是笔者从关于人性的基本理论出发，对中国的社会、家庭、人的种种现象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其实也即关于中国人的人性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以上的三卷《文存》基本上总汇了我二十多年来的思考和求索，正是在这些思考和求索的基础上，笔者才可能并决心致力于关于“人学”的总的体系的创造，笔者期望此生能最终完成它们，它们将至少包括如下四部著作：《问人性》、《问天命》、《问历史》和《人学大全》。

我决不讳言我想要创造自己的体系，而与一切害怕谈体系甚至扬言“创造体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的中国文人划清界线。在我

的思想体系的后面应是所有中外伟大的思想家,在中国,特别应指先秦时代的中国圣人,以及近代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的先驱。至于长期以来的中国大量的文人,他们都是一些非常聪明的擅长博闻强记、善于寻章摘句的人士,但也常流于人云亦云,漫泛于拾人牙慧,从而终于难免充当知识上甚至人格上的奴才。与他们相比,我大概永远只能是一个执拗、偏颇、好争论、好打诨语的傻子。尽管如此,我仍旧坚持认为,中华民族如果想要有所希望,有些聪明的文人还是少一些为好。有的纯粹出于虚构的“武侠”,有的则从大量中外故纸堆中云游过一遍的读书笔记式的“巨著”,这种东西有一点其实并不算什么,但由于文人们出于自恋心理的大量无原则和无意义的吹捧,使之任意泛滥且被大量后辈青年所仿效,则实非中华民族之福。虚妄不实,夸饰取巧,这是长期以来中国文坛、学坛的痼疾,唯但愿青年中国学人能永以为戒。

最后,笔者必须在此特别感谢湖北人民出版社的同志,他们为本《文存》的出版所花费的心血和给予的大力支持,笔者将终生铭怀。谨以此为序。

黎 鸣

1999年4月9日于北京

目 录

《黎鸣文存》第一卷·《人生的求索》

论书法艺术及其美的价值·····	1
汉字,统一全人类语文的最佳选择·····	60
威利·洛曼为什么死·····	72
艺术、科学、信息与哲学·····	76
论学术自由·····	83
交叉科学与社会的完整性·····	94
中国传统文化有“人文”主义精神吗·····	98
中西文化“历史—逻辑”结构差异探源·····	101
也谈“应该遵守逻辑”·····	110
论中西文化“历史—逻辑”结构的差异·····	114
论“百家争鸣”·····	135
文化选择与哲学反思·····	139
试析“人文精神”论争中的潜台词·····	142
“跨越世纪”的中国背负着沉重的文化包袱·····	149
读广告有感·····	152
仍说“周公吐哺”·····	154

论人、神、哲学与文化·····	155
文化教育中的“终身选择”必须停止·····	175
文化研究中的科学与哲学问题·····	179
传统纹索与科学精神·····	191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与“社会改革，公民有责”·····	194
论嫉妒及其危害中国社会的根源·····	196
谋略学是中国人真正的国学·····	206
“豆腐”，中国最伟大的人性精神谋略的象征·····	212
“谋略学”世界第一不必光荣，“豆腐”世界第一不必耻辱·····	217
人性恶，兴谋略·····	220
社会性：谋略化的人类本性·····	224
权力：人类任性原恶的谋略化工具·····	230
金钱：人类懒惰原恶的谋略化工具·····	237
良心是什么？现代人难道不需要有良心吗·····	244
“创造思想体系的时代”真是“过去了”吗·····	250
’97 读书杂谈·····	256
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与“未来三部曲”·····	263
斯宾格勒与《西方的没落》·····	268
漫谈汤因比和他的《历史研究》·····	274
马克斯·韦伯和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280
李约瑟问题与世界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	288
克尔凯郭尔的存在主义及其《或此或彼》·····	295
文化决定论、自由价值与英雄的人格·····	299
《信息时代的哲学思考》原自序·····	335
“新权威主义”的因和果——《评新权威主义》序言·····	338
《信息哲学论》自序·····	341
《戴本孝评传》序言·····	343
《问人性》自序·····	347
《问天命》自序·····	358
展望新入学——《问天命》跋·····	363
人学的曙光——《审判总统》序言·····	366

《控制论与社会》译序·····	370
《社会控制论》译序·····	372
《东亚文明》译序·····	375
《费正清自传》译序·····	383
《东亚之锋》译序·····	385
《现代科学与人类价值观》译序·····	388
《一般系统论》译序·····	390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译序·····	394
《中国的危机与思考》编序·····	399
“全国人体健美展览”开幕词·····	401
一位向中国古人学敞开人类未来希望大门的西方人 ——读马斯洛有感·····	403
两千年纪末的历史反思——《中国的危机》序言·····	410
为亨廷顿的书重新命名·····	418
甲骨文,一种原色文明探源的故事——纪念甲骨文发现 100周年·····	423
三次跨越千年纪的人类及其文明——一个“红、黄、蓝”的 历史寓言·····	447
诗词选·····	463
忘了吧,哥!·····	483

论书法艺术及其美的价值

在所有的艺术部类之中，最能集中地表现中华民族（其中尤其是汉族）的传统文化风格的莫过于书法。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书法艺术既表现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优美、精湛、典雅、含蓄的一面，又表现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僵化、散漫、浅薄、神秘的一面。一部中国书法的演变史可以相当本质地反映中国文化的演变史。从象形、表意的汉文字的最初的发明到它的后来的种种书写的字体和风格的嬗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看出中华民族的哲学观、宇宙观和人生观。不妨试举几例。

汉字的一形、一音、一义，实质上反映了中国古代儒家经典易经和道家学说的哲理：天、地、人相感、相应且相互统一的原理。中国人自古以来即擅长从阴阳、五行、八卦、六十四复卦、三百八十四爻……等等变易的状态中找出同时对应天、地、人、乃至万物的关系，并且进而从这些关系的明喻或暗喻中求得对世界的解释办法，这种解释实质上等于占卜加常识；中国古代人没有建立起逻辑的解释习惯，也即从基本有限的抽象概念、公理出发，通过演绎、推理进行逻辑解释的习惯。

中国自古以来的所谓书法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所有可能存在的其他理论一样，基本上偏重实际工艺操作过程（或技法）的具象描述，再不然就是一连串难着边际的极其夸张的比喻，诸如高空坠石、万岁枯藤、拔镫、折钗、印泥、划沙、流痕、争道等等，这明显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非科学的品格。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自古以来即缺乏形成近现代“理论”的最基本的要素：抽象的具有普遍性

意义的概念和公理体系(例如古希腊欧几里德几何中的点、线、面以及五种基本公理假设)。不存在可以用于逻辑演绎的理论即不存在可以使语言的意义明晰、精确的品格,从而便不容易具备可以通过实践明确加以证实的根据,这一来也难以提供可以用于明确评价的标准。历来在中国书法作品的审美评价上便是如此。一幅书法作品的好坏优劣,往往评价的意见极其相左,评者个人主观情感的倾向非常强烈。人们或者惯于按照古代书家的流派、风格来喻示待评价的书法作品,比如宗法二王、颜中兼柳,有吴兴的姿媚,含香光的散淡……诸如此类,意义相当含混;再不然又是一连串风、雨、雷、电、云、雾、水、石、刀、枪、剑、戟、鹰击、鱼翔……等等夸张的形容。说到底,今天书法界人士的语言依然在古人的字汇中打圈子,远没有任何突破。正因为这样,目前书法界在关于书法艺术如何现代化、如何创新的种种方面出现了相当茫然和盲目的倾向。少数书家索性丢开传统书法艺术的根本特征,以画代字,或甚至无画无字,只有一些线条、墨迹,盲目仿效西方抽象画派的方法。窃以为,这种自由探索的精神固然可嘉,人们也大可不必妄加指责,但这样的“书法”与“创新”实在不太相干,而只能说是缺乏理论思维的反映。

笔者爱好书法,亦爱好理论,很愿就有关书法艺术的种种问题提供一些意见供书法界的朋友参考并欢迎批评指正。

一、书法艺术有没有前途?

人们或许会认为,提出这种问题是相当荒唐的,或者至少会是杞人忧天,毫无现实意义。其实,这个问题是很有必要认真加以讨论的,就像曾经有人提出过中医中药有没有前途、中国传统戏剧曲目有没有前途等问题一样,是必须加以回答的。之所以必须回答还因为,的确存在“没有前途”的可能性,而且事实上也曾经一度严峻

地作出过这种回答；同时，即使人们都认为“有”前途，也应该尽可能指出之所以“有”前途的客观条件和人们的主观条件，以及“前途”究竟是什么。

书法艺术是中国文化独有的艺术，或者更确切地说，因为这种艺术已经广泛传播到日本、朝鲜、越南，它是东亚地区人类独有的艺术。这种艺术存在的前提是汉字的应用。可是事实上今日朝鲜、越南已经不用汉字，韩国汉字运用已极少。据称，到大约 2091 年，汉字将最终在日本文字中全部消失。那么，汉字在中国本土是否就能够永存呢？如果不能永存，作为以它为前提的书法艺术自然就是没有前途的。这决不是作者故作惊论。事实上，长期以来“汉字必亡论”早就盛行于中国大陆。书法界的老先生显然会比我更清楚，自 1949 年以来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的书法艺术实际上是并不很景气的。所谓“书法热”（包括硬笔书法）只不过是近几年的事情。几种专门研究书法艺术的杂志也只近几年才面世，这当然是好事，但也确实反映了向中国传统文化复归的倾向。相对而言，“汉字必亡论”自然是反对传统文化的革命观点。

回顾历史可以知道，早在 20 世纪初“五四”运动前后即开始流行“汉字必亡论”的观点。当时主张这种观点最炽者是钱玄同老先生。钱玄同老先生认为，自古以来凡用汉字所写成的书籍，没有半篇不是废话连篇、奴性十足，要废除中国所有害人的“经典”，除非“汉字革命”。伟大的共产主义革命导师列宁曾经指出，“文字的拉丁化是东方伟大的革命”。鲁迅先生直到临终之前还不无遗憾地断言，“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甚至把汉字比作是妨碍中国民众力求上进的“癌”。郭沫若先生在送给鲁迅的挽联中也写道，“旷世名著推阿 Q，毕生杰作尤拉化”（即指汉文字的欧化和拉丁化）。关于汉文字的彻底革命，中国共产党人一直是非常支持并积极提倡的，且首先带头在中国推行汉文字拉丁化的运动。1931 年 9 月在西伯利亚的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中提出了“中国新文字十三原

则”，1935年红军在延安即开始了文字拉丁化的干部的培训。1940年11月在延安成立了新文字学会，发起者均为著名的中国共产党人，如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徐特立等，毛泽东主席亦署名表示支持，这次会议还曾确定11月7日为“中国文字革命节”……1958年2月，国务院正式公布《中国语罗马字表记法》，并决定当年秋季开始，中国小学一年级语文课本即采用拼音教材，一直至今。

且不论汉字拉丁化之举究竟在多大理性程度上存在有多大实际的价值，这个问题无疑不是今天任何人即可以骤然定论的。仅就中国共产党人敢于坚定地挑起反对封建主义传统文化这个重担的革命精神而言，也是极其令人肃然起敬的，更何况这种精神曾经给中华大地带来春意盎然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文化的生机。诚然，“汉字必亡论”者不独在大陆，也不独为早期的共产党人，即使在海外、在现时代也大有人在。例如旅日台湾学者黄文雄先生在其《中国之没落》一书中也同样持有这种观点。

对于“汉字必亡论”，笔者虽然持反对的态度，然而笔者依然非常钦佩鲁迅先生以及早期共产党人的敢于革命的精神，并部分赞同他们的论断，即汉文字过分依赖视觉形象的特征，以及它的分散性、繁复性和无系统性，在数千年中国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助长了封建特权贵族阶层对民众肆加愚弄和专制的气焰，阻碍了中国思想体系中逻辑公理性的发展，阻碍了新知识的生长，等等。但笔者感到，把这一切有害的方面全都归罪于文字，也未免显得过于极端，真要从根本上作出改造，也过于遥远。

几千年来，在语言、文字的基础上形成的观念、习俗、制度、政治伦理学说等等或许更重要。从近期来说，反对这些方面的有害传统毕竟要比从根本上断绝有几千年历史的语言文字要显得更为迫切，也更为现实。如果仅仅只是为了消除古代经典的影响而毁弃文字，倒不如索性烧毁所有古典经籍来得痛快。这无疑是非常幼稚的。销毁古代经典不仅不能取代从思想上批判传统文化，反而陷自

已于比“全盘西化”还更为可恶的彻底的民族虚无主义。关于这一点我想已经很清楚,可以不必再论。或许更重要的是,笔者倾向于认为,在信息化时代随着汉字可以通过计算机处理,中国文字遇到了一个可以起死回生的关键的转机。兼有形、声、义三元特征的汉字因其信息量的高度集约化,从而有可能比西方的拼音文字更有利于作为人类观念文化的载体。虽然笔者尚不敢如有些人那样,即大胆地宣称,21世纪是汉字文明的世纪,但多年来对信息以及信息哲学的探讨使笔者确有类似的直觉的信念。正是因此,笔者深信,汉字可以永存。

汉字可以永存,是否书法艺术也可以一定会有前途呢?这样简单的推论却不断然成立,实际上中国传统书法艺术早就面临严重的危机。纵然近年来社会上兴起了所谓“书法热”,以及人们对于硬笔书法的广泛兴趣正把古典的毛笔书法艺术推衍扩散开来,然而对于克服书法艺术所面临的危机来说,依旧是无济于事。问题的症结在于,尽管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书法艺术实践丰富多彩,斑斓多姿,书法流派、书法风格渊源悠久、代出不穷,但却从来缺乏实际有效而又系统的理论对之作出恰当的总结、概括(这一点与中国的古代科技发明和发现具有相同的命运),从而也就缺乏相对明确的审美准则,缺乏进一步创新的方向性动力。一切都在习古、复古,或者盲目非古的茫茫浑沌之中冲撞和挣扎。可以认为,自明清或者甚至更早自宋代以来,中国书法艺术的进步便已经开始缓慢下来并逐渐趋向停滞和茫然的阶段。明人尚态的狂热、清人复古的流风并不能挽救中国书法艺术的没落。一方面,人们言必称汉魏、称晋、称唐、称宋;另一方面,也确实在五百年间无一人可以从书法的传统功夫上能与赵文敏相颉颃,自然更难谈有二王、欧虞、颜柳、米黄等的开创流派之功以及他们的韵致和意态。书法艺术随着时间的曲线基本上呈富士山形的正态分布,晋、唐达于极盛的顶峰,而在此之后基本上是近古不如远古,今不如昔。造成这种后果的根本原因

即前文所述,我们的祖先在进行丰富的艺术实践的创造的时候并没有同时也作出与之相称的理论思维的创造。这一点与中医中药的情况极为类似。中医中药的经典依旧是《黄帝内经》、《伤寒论》、《本草纲目》之类,其理论框架始终超不出由易经所提供的天、地、人相对、相生、相感、相统一的观点,从而不断地在阴阳、五行、有机循环论等等之类观念中讨生活。数百年来中医停滞了,中药停滞了,中国的科技发展停滞了,中国的社会发展停滞了,中国的文明进步停滞了,中国的书法艺术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共命运,同样处于停滞之中。

结论是明确的,要想推动中国书法艺术在今天的进步必须要有理论的突破。如果不然,今天的书法艺术也同样只能在习古、复古,或盲目非古的不断循环重复的过程中讨生活。或许其命运还不如明清,因为我们现在还有一种较之古代闲散文人的不利,今天的人们有更多的工作需要去从事,没有谁会只是为了练习书法而去耗散自己本可以更有创造力价值的时间生命。如果活在今天,智永、怀素恐怕不会再去发傻写秃几竹簌笔头、写尽满园芭蕉(树叶)。这样一来仅就传统技艺、手头功夫而言我们就可能会略输古人一筹。

然而我们今天也具有古人所不可能具有的长处:信息丰富,交流便利,如果更加上理论精湛、培训(方法)科学,我们也将会事半功百,全面超越古人。并且书法将不再是少数文人雅士、士大夫官僚的艺术,而会成为人们普遍的逸兴和表情的艺术形式。

二、对中国当今书法艺术活动的评价

中国书法艺术基本上是在冷落了将近三十多年之后,直至近几年才又重新获得更多的人们青睐,且出现了所谓“群众性的书法热”。书法家沈鹏先生称此为“群众性的向民族传统寻根的热潮”,

并认为“书法热也是对于禁锢思想、束缚个性的一种反叛”。^①我很赞同这种看法,但也对所谓“书法热”存在某种疑问,究竟有没有真“热”,怎样才算真“热”,仅仅少数书家或再加上大批退休下来的党、政、军老干部的热中是否就真算“热”了?当然有一点是应当肯定的,相对于前三十多年的书坛冷落,这确可以算“热”了:全国各地成立了各级书法家协会组织;举办了无数次各种层次的(软笔、硬笔)书法作品展览和竞赛;创立了专门研究书法理论和技艺的刊物;增加了与海外、日本、甚至欧美在书法艺术方面的交流和相互切磋等等。不过,作为一种对比,我们可以注意到,在日本,书道人口(即从事书法艺术活动的总人数)到昭和五十五年(1980年)五月为止已达1560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3.3%。^②如果按照这个比例,中国从事书法艺术活动的人口至少应在一亿五千万人以上,我看,中国实际情况恐怕会离此数相差甚远。就从事书法艺术活动的人口的群众普遍性来看是如此,从书法艺术作品的水平和创新的活力方面看又如何呢?我认为也是存在不足方面的。从刊物所登载的现代书法作品和几次大型书法展览的情况看,现今书法作品的水平比之明清甚至民国时期或许还有一段距离,这还只是从笔法、结体、章法等书法艺术技巧或书品的标准看,如果还同时兼从文品和人品(即从事书法艺术活动的作者的学问素养、文化背景、人格气质等)方面看的话,可能差距还会更显得大,会令人感到现今的书法作品更俗、更熟、更缺乏思想内涵、更具有书匠气而更难闻书卷味。究其原因,可能还是前面提到的,自世纪初以来,“汉字必亡论”以及随同而来的彻底反封建传统文化的革命浪潮席卷中华,江海横流,鱼目珍珠不及分辨。一切都为新的意识形态服务,而在这种服务之中,传统书法艺术比之绘画、音乐、戏剧等其他

^① 见《中国书法》,1986年第1期。

^② 见《书法研究》,1983年,第14期,上海书画出版社。

艺术部门来说最显无力,不仅无力,或许还更易流露出封建文人的怀古念旧的情调。这一来自然书法艺术在新的历史时期会更难以获得新的生命力。如今虽兴起了“书法热”,毕竟底气太薄,艺术活动不是群众运动,其水平的提高不是短时期即可奏效的。这一点我们通过中日当今书法作品的比较将可得到更清晰的印象。

为比较方便起见,我们不妨直接以已经出版的《上海、大阪书法篆刻展览作品集》(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为例。上海的书法艺术水准在中国书坛是不能算弱的,但与或许还不能算是日本书坛最高的大阪比较,差距就已经相当明显了。从作品集中我们很容易看出如下几个特征:上海作品中篆书、隶书、楷书的比例明显比大阪高;上海作品中的字数普遍比大阪多(反面观之,大阪作品中行书、草书比例明显高,每篇作品中字数明显少),这是从书体看。从行、草书的结体看,上海作品更拘泥于传统正确写法,从而更显得呆板,缺乏变化;反面观之,大阪作品字写得更率意、更无拘束、更具变化。再从书作的章法看,差别就更大。上海作品中的字的分布更显得均匀平衡,墨色分布、节奏更显得单调,字幅中显然更缺乏速度感(时间感)、韵律感的变化;反面观之,大阪书作更重非均匀、非平衡,更重墨色、韵律以及速度感的变化。概而论之,笔者主观上认为,上海的书法家们更重视再现传统汉字书体的“正确”写法,而较少顾及个人“心画”的书法。比较而言,大阪的书法家们则更似乎重视通过书写(汉字或假名)来表现一种书道的韵味、一种个人的情趣,即使从更深层的书法文字的内容看,也不难体味、微察到文化背景、艺术素养的差异。固然,笔者的看法不必很准确,但我想,我们至少可以共同认识到,日本长期以来一直就重视的书道在艺术创新的路数和水准上的确要比中国书法艺术的现状要更宽些、更高些。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固然与我们前三十年对书法艺术有所忽视有关,然而笔者认为,同样重要,或许更重要、更深远的一个原因是,传统书法理论的陈旧和新理论的缺乏。近年来引起激烈